

考古学的公共使命与时代担当

王仁湘

在旧岁新年交替的当口，我的朋友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涛教授告诉我，他的一本关于公共考古学的新书要出版了，嘱我写序。这书这事，为我兴趣之所在，这个序也是我即将卸任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收官之作，乐意为之。

考古与公共考古，如日月相随，在我不久前出版公共考古随笔集《月西日东》之时，取“日”与“月”作书名，既是象征性比喻两者的联系，也是在思考两者的意义。现在又读到王涛教授的新著，并产生许多深入思考。

我们知道考古学这门探索人类过往的学科，从来就不应只是象牙塔内的精专之学。它源于我们对自身从何而来的永恒好奇，其终极价值在于照亮来路、启迪当下、滋养未来。将深邃的学术发现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让地下的沉默遗产“开口说话”，成为时代精神图谱的生动注脚，这是当代中国考古学责无旁贷的公共使命。本书作者王涛就是这样一位公共考古的积极践行者，他除了日常开展史前考古、田野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还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建公众考古学中心、开设公众考古学课程、招收公众考古方向研究生，也为我负责的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委会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文集，是王涛教授多年来公共考古实践与思考的记录，内容从理念辨析到田野实践，从校园课堂到社区乡土，从媒介传播到文明阐释，脉络清晰，蔚为大观。展读之际，感慨颇多，让我又看到不少新的希望。

纵观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公共考古的基因早已深植其中。从安特生、李济等先贤的拓荒与启蒙，到苏秉琦先生“考古是人民的事业”的论断，再到今日“让文物活起来”的时代强音，一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位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大楼西北，1972年由蒋赞初先生主持清理，并于次年在《文物》第4期上刊发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简报。学界普遍认为该墓为东晋帝陵，是研究东晋陵墓制度不可回避的关键材料。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简报发表较早且介绍相对简略，已经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研究之需。2023年，由张学锋教授领衔主编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报告出版，该报告是一本单座六朝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在坚持以公布考古材料为目的的基础上，对报告的体例、格式、内容三个核心维度进行创新，较好地回答了考古发掘报告“框架的搭建”“‘述’与‘论’的逻辑”“问题意识的导向”等问题。

框架的搭建

考古报告是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是考古学研究的资料信息库。1934年出版的《城子崖》开创了我国田野考古报告的先河。此后，随着发掘者、研究者对考古学思考的不断跟进，考古发掘报告不断融入多学科交互的研究以及“发掘者说”等新内容，著作性不断增强。但无论内容如何丰富，考古发掘报告应当有合理的编写逻辑，搭建出结构清晰的框架，让读者更易于理解考古材料。

单座墓葬的考古报告并不少见，仅就魏晋南北朝而言，就有元祉墓、曹连石棺墓、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田弘墓、安伽墓、史君墓、宇文猛墓、裴容墓、韩念祖墓、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等。这些墓葬均属北朝，墓内或有较为繁缛的壁画装饰，或有内涵丰富的石葬具，抑或有成组的俑群，在报告编撰过程中往往加以突出。如《北周史君墓》发掘报告中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合归一章，包含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壁画等诸多内容，而葬具、浮雕彩绘图像和石刻图像内容则单独成章，意在突出葬具以及图像材料的丰富性和重要性。相较而言，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既无壁画装饰，内容也相对简单，因此，如何搭建起框架以系统详尽地公布考古材料，是该报告编纂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该报告记叙逻辑可归纳为：对墓葬空间内容的逐层介绍和对墓葬发掘整理的顺序还原，时空体系节奏化叙述。由此搭建出一套更具可读性的发掘报告框架。

报告主体部分以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发掘及清理经过、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种类、结语等六部分公布了墓葬的基本信息。“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采用时空并叙的形式，将读者视野聚焦到墓葬所在点位，并详细梳理了墓葬所在位置的历代沿革。“发现及清理经过”部分记录了发掘清理及简报整理的过程，在报告中起到“桥梁”作用，将叙述引入墓葬本身。“墓葬的形制结构”采取逐层放大的叙述模式，在对墓葬朝向和整体结构进行描述后，再分别对墓门与封门砖、甬道、侧室、主室几部分进行介绍，而后进一步聚焦，对墓内铺砖和墓葬用砖进行介绍。至此，整个墓葬的形制样貌得以生动地呈现在读者脑海中。“葬具与随葬品的分布”是墓葬形制介绍与器物介绍之间的衔接，同类型发掘报告往往单独设置该章节，这一部分的设置让读者对随葬品“情境”有了更具整体性的认识。“随葬品种类”部分在随葬品分布的基础上，按照质地分类，对随葬器物进行详细介绍。

概言之，报告的编写结合了空间体系介绍的逐级放大与时间体系介绍的逐步还原，使得读者能够清楚了解北园东晋墓的全貌。

“述”与“论”的逻辑

考古发掘报告既是材料的记叙（即“述”），也包含了编写者对材料的解读（即“论”），后者是发掘报告“著作性”的集中体现，如何将资料的陈述与解读结合，是编写者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掘报告是发掘简报近半个世纪后的资料再绘，报告主体部

部中国考古史，亦是一部考古学不断走向人民、服务社会的历史。本书第一编“公众考古学认识”正是对这一历程的梳理与反思。它提醒我们，公共考古并非简单的知识“科普”，而是学科社会化的自觉进程，是考古学与当代社会深度对话的必然产物。它要求我们超越单向的知识输出，构建与公众、社区、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与共情。

如何践行这一理念？本书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答案，这些也是王涛教授身体力行的例证。在高校，考古教育成为连接学术与社会的桥梁，系列讲座、研学考察、校园开放日，在青年学子心中播撒下文明传承的种子；在发掘现场，社区考古实践致力于将“你们”的工作转化为“咱们”共同的事业，通过专题展览、乡土课堂、口述历史，使考古工作融入地方文化肌理，激发在地社区的认同与守护；在媒体与博物馆，考古成果通过精心策划的电视节目、深入浅出的展览、新颖的融媒体产品，突破专业壁垒，飞入寻常百姓家，重塑着社会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自信。三星堆等案例的成功“出圈”雄辩地证明，当考古主动拥抱时代，运用恰当的话语和媒介，便能引发广泛共鸣，成就文化盛事。

尤为可贵的是，诸文并未停留于经验描述，更蕴含着深刻的学理思考。它们探讨了考古成果从“我们”的学术故事转变为“咱们”的社会故事所面临的挑战与路径；反思了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公权与私益、专业与大众、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更立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

考古发掘报告的三个维度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读后

张惟杰 刘述孟

分以资料陈述为主，附篇则为阐释讨论。在编纂过程中既把握了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 and 时效性，又结合研究融入了材料的解读、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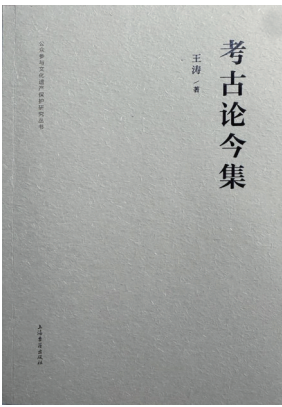
客观性体现在对田野材料本身的合理记述。该书主体部分以资料的客观陈述为主，整理者由材料延伸出的相关认识则被放在了附篇部分，正如整理札记中所言“整理者获得了不少心得，但为了不影响读者对出土遗物及墓主人身份的自主判断，有些心得便置于报告结语中”。完整性体现在对跨越半个世纪发掘材料的清点、整理。邹金丽、李梅田先生指出，对早年考古发掘资料的重新整合应着重解决“清点、修改、补充”三个问题，其在《对早年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报告编写的思考》一文中即列举了《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报告编写采用的两套编号体系，一是发掘结束后延续至1975年的继续整理，冠以年份“75”；二是21世纪初，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再次对文物进行统一登账，两次编号数目一致。对葬具、随葬品及其组合的处理，既补充了基于关键遗物位置信息的推测，同时又对出土器物进行了修复、拍摄绘图并予以更为准确地测量、核定与描述，如对陶三足盘、耳杯、带凹槽器、青瓷勺、石板等器物基于现存情况进行数量列举，与简报中描述的数量不尽相同。时效性体现在整理者依据现行的命名方式，对诸多器物的名称进行了调整，如对案和榻进行了区分，还将陶果盒改为了榻，双耳壶改为青瓷盘口壶，青瓷点彩四系盘口壶改为青瓷褐斑点彩四系盘，辟邪改为青瓷狮形插器，长条形金叶片改为长条形金饰片，错金铜片改为鍍金铜带具，青铜鸟头改为青铜鸟饰件等。

除对“述”的三点原则的把握外，报告主体结合考古学研究合理加入特定视角的“论”，重点体现在“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部分以城市考古视角精准解读墓葬所在地的历史信息，有别于一般报告对墓葬位置的宽泛描述，以及“葬具与随葬品的分布”部分从丧葬礼仪、墓内祭祀空间视角剖析随葬品组合，有别于一般报告“重遗物轻情境”的介绍方式。此种“述”“论”结合的编写模式也见于其他部分，如“墓葬的形制结构”部分对侧室的描述加入了与耳室的甄别，体现该墓侧室的独特性。又如 在介绍随葬器物时，将后期混入的4件南朝瓷器与墓中的东晋瓷器区分开来，在阐释遗迹之间叠压打破关系的同时，也为后文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依据。

总言之，该报告在“述”中详细再绘了半个世纪前的发掘材料，又在“论”中融入随考古学发展带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现出适应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特性，为历史时期墓葬报告特别是早期积压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提供重要参考。

问题意识的导向

苏秉琦先生曾指出“重材料、轻问题、缺思想是中国考古学的大隐患”，他呼吁要关注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中国文化如何起源等。这一说法虽更多指向史前考古，但也指出了材料需与问题紧密结合。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同类型的发掘报告中不乏加入大篇幅研究论述的案例，如《宁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报告分为“绪言”“发掘篇”“研究篇”三大部分，“研究篇”部分两章标题均体现研究重点——墓志，虽还包含了其他内容，但仍以墓志研究为主，内容丰富，追求研



重大课题，思考如何将“中国之问”的学术答卷，有效地转化为“大众之需”的文化滋养与“时代之魂”的精神标识。这些思考，标志着中国公共考古学正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实践探索迈向理论构建。是的，由“我们”向“咱们”的换位，由自发向自觉的提升，这是公共考古前行的新方向。

考古人在这样的换位中得到历练、得到提升，考古学科也因此获得前行的更大动力。考古学所揭示的，是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

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份沉甸甸的遗产，属于每一位中国人。让考古成果惠及全民，让文化遗产赋能社会，是考古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本书所收录的，正是这一征程中坚实的足印与明亮的火花。它不仅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启航。期待王涛教授这本文集能够成为中国公共考古事业的一个重要节点，激发更多同行者的思考与行动，共同推动考古学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我虽然即将退岗，但作为一个关注者，也会继续为公共考古的新进展鼓舞欢呼，我们的前方一片光明。

（本文为《考古论今集》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论今集》
作者：王涛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究方向的多样性。《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则更注重“核心问题”在整部报告中的串联作用。“编辑前言”中写道：“我们编辑此书，将墓葬的发掘过程及现存的出土文物以考古报告的形式悉数公布，以期为六朝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以及中国陵寝制度的研究提供可信的资料。”“丧葬礼制”可谓中古时期墓葬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该发掘报告的编写始终围绕着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墓主人身份。报告“附篇”就是围绕这一问题的集中讨论，而在诸家探索这一直接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汇着对“丧葬制度”的反复思考。

墓主身份牵扯到墓葬研究的多个方面，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作为东晋早期帝陵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因墓葬中缺乏明确的文字材料，该墓的归属自发掘以来颇有争议。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及墓葬结构与随葬品的特点，学界普遍认为该墓的墓主为东晋前期元、明、成、哀四帝之一，但至于究竟是哪一位皇帝，则有不同意见。目前而言，关于该墓墓主的认识，较为集中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该墓为元帝的建平陵，与之合葬的为追尊的虞皇后及明帝生母荀氏；二是认为该墓为成帝的兴平陵，合葬者为杜皇后和“仪服同于太后”的哀帝、废帝生母周太妃。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需要明确该墓主室与侧室的营建次序，即二墓室是同时期营建，还是有先后次序。原简报中并未涉及此问题，后续的相关研究中不少学者作出推测，既有同时修建之说，也有先修主室、后修侧室之论。而本报告附篇的札记中编者就墓葬形制讨论时明确指出“这次整理工作开始之初，笔者就意识到必须解决（侧室阙筑是否晚于主室）这一问题”，诚然，编者敏锐地从墓葬用砖及墙体厚度出发，指出了主室与侧室的先后关系。其后在对墓葬发掘主持者蒋赞初先生的访谈中，还专门谈及这一问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比较明确。当然，报告并非一家之言，虽编纂者认为该墓为成帝的兴平陵，且主室和侧室非一次修筑，但附篇也收入了该墓为元帝建平陵、墓葬未经改建等观点的文章，为读者思考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以上种种，均是围绕着“墓主是谁”这一问题展开，这也是研究东晋帝陵的重要前提，体现了本报告较为明确的问题意识。

当然，本文在细节方面也有微瑕，如第28页，器物登记号：75—632、藏品登记号：8075的青瓷钵，文中介绍“线条比较简单瘦削，不像南朝时期的流畅肥硕。据描述，亦当是一件扰乱进来的南朝器物”，令人颇为费解。另外，因该墓为帝陵，如能附上文献中有关东晋帝陵的材料，对理解该墓或更有益处。

总而言之，该报告在搭建了合理逻辑框架的基础上，合理平衡“述”“论”关系，以问题为导向对发掘资料进行再梳理、补充研究材料，尊重半个世纪的考古学科发展规律与细节成果，裨补缺漏，生动再现了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发掘成果，为同类资料的整理与报告编修提供了范式参考。

（作者单位：南通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所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
编著：南京大学博物馆
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以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为重心的东北地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工作的正式开展，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之一（赵宾福，2021）。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虽然学者们对东北各地不同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辨析、时空框架的构建和文化谱系的梳理等研究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但能从整个东北地区出发，具有完整性和体系化的学术著作至今屈指可数。2025年，由吉林大学赵宾福先生主编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全三册）丛书正式出版，丛书之一《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以下简称《东北新石器》）由四川大学杜社伟副教授完成，学界的长久期盼终于成为现实。

主要内容

《东北新石器》全书共55万字，包括11大章、57小节，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文化辨析和年代学研究。《东北新石器》把东北地区划分为9个区域，将目前所见的所有新石器时代遗存全部纳入43支“有名有姓”的考古学文化，并明确了每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分布范围、持续年代和文化内涵。具体如：辽东南地区，共有小珠山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上层文化5支考古学文化；辽西地区，共有小河西文化、西梁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哈民忙哈文化、南宝力皋吐类型和道老杜遗存9支考古学文化；辽东北地区，共有新乐下层文化、后洼上层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北沟文化4支考古学文化；西流松花江流域，共有左家山下层文化、大青川遗存和左家山上层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嫩江流域，共有后套木嘎一期遗存、双塔一期文化、黄家岗子文化、左家山下层文化、后套木嘎三期文化、后套木嘎四期遗存、哈民忙哈文化和昂昂溪文化8支考古学文化；海拉尔流域，共有哈克一期遗存、辉河水坝一期遗存、哈克文化和辉河水坝二期遗存4支考古学文化；乌苏里江流域，共有小南山一期遗存、小南山文化、新开流文化、小南山四期遗存、小南山五期遗存、石灰场下层文化6支考古学文化；图们江流域，共有以迎花南山H1为代表的遗存、兴城下层文化和金谷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牡丹江流域，共有振兴文化、亚布力文化、莺歌岭下层文化3支考古学文化。需要说明的是，这43支考古学文化并非简单9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数量总和，一些考古学文化明显横跨了两个区域，如偏堡子文化在辽东南和辽东北均有分布，哈民忙哈文化在辽西地区和嫩江流域均能见到，石灰场下层文化在乌苏里江和牡丹江流域均有分布。

第二部分，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东北新石器》把9个区域43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都“串联”了起来，进行了系统的时空框架构建和文化谱系研究。首先是在单个考古学文化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9个区域的横向比较，把东北新石器考古学文化整体划分为11个小时段和4个大时代，为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做了充分的准备。其次以器表装饰为切入点，将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大系统。之后更进一步，将源于辽西小河西文化的之字纹系统、源于辽东北水洞下层的刻划纹系统、源于乌苏里江小南山一期的点线纹系统和可能源于嫩江流域双塔一期的绳纹系统归入“原生型文化系统”，将绳纹系统划分为“次生型文化系统”。最后以4个大时代、11个小时段为时间坐标，以文化系统为单位，对公元前1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各文化系统的互动和文化格局的变迁进行了生动描绘。

主要特点

作为一名东北新石器研究的初学者，笔者认为《东北新石器》至少体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学术传承性。2003年，由赵宾福先生完成的《东北石器时代考古》出版，这是21世纪第一本关于东北地区石器时代考古的综合性研究专著。2009年至2014年，杜社伟在赵宾福先生的指导下，硕博连读，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东北南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毕业后的10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补充完善东北北部地区的相关研究。从2009年到2025年，十六年磨一剑，最终圆满完成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术接力。

二是学术前瞻性。20多年前，赵宾福先生的《东北石器时代考古》梳理了东北地区8个区域当时所有的30支考古学文化。2025年，杜社伟的《东北新石器》以《东北石器时代考古》为蓝本，整理出东北地区9个区域内的43支考古学文化。从“30”到“43”，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进入21世纪，东北地区特别是在辽西地区和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田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这为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宝贵契机。如辽西地区的哈民忙哈遗址、南宝力皋吐遗址，嫩江流域的后套木嘎遗址、双塔遗址、洪河遗址，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相关遗存的发现，或能充实、深化原有的考古学文化内涵，或使提出、命名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成为可能。《东北新石器》紧盯考古

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新起点

——读《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
任瑞波

新发现，紧扣学术最前沿，充分利用相关考古新材料和学术新成果，构建起分布地域全面、时间刻度精确、文化内涵丰富的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

三是学术创新性。《东北新石器》不仅有新材料的补充和对老问题的深化，还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如在考古学文化辨识方面，首次将辽西地区学术界认为属于哈民忙哈文化的道老杜遗存辨识出来，另立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明确指出，这类遗存为红山文化的流向提供了新线索。又如，在文化系统的划分方面，在已有研究的“之字纹系统”“刻划纹系统”“泥条堆纹系统”“点线纹系统”等东北新石器文化系统群的基础上，增加了绳纹系统，将东北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统归为五大系统。再如在文化格局分布方面，得出了一些重要认识：在查海时代，之字纹、点线纹、堆纹三大系统“三元并立”，之字纹系统南下北上；在仰韶时代前期，之字纹专注东进，点线纹西进南下，二者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仰韶时代后期，之字纹与点线纹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各种文化系统形成“多元并立”的格局；在龙山时代，之字纹和点线纹最终退出东北地区，堆纹、绳纹和刻划纹三个系统在东北形成“三强并立”的格局。

需要讨论的三个方面

由于涉及区域广袤、材料繁杂、观点多样，《东北新石器》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空间和讨论的余地。

第一，个别区域研究有待补充。尽管《东北新石器》是目前涉及范围最全面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专著之一，但在划分的9个区域中，缺少黑龙江流域中游的相关内容。

第二，部分重要年代还需讨论。《东北新石器》将乌苏里江的石灰场下层文化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晚期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如果这一认识无误，那么乌苏里江新石器时代的下限无疑是公元前1400年，但这与全书将公元前2000年视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青铜时代开始的统一时间界线似有矛盾。

第三，一些表达形式有待统一。《东北新石器》前九章最后一节均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流域的编年序列总结，小节标题有“编年坐标”“编年序列”和“编年”三种不同的称谓。从形式上看，如果这些表述能够统一，整个著作会更加完美。

一点感悟

从1921年瑞典学者安徒生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到1959年夏鼐将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理论介绍给国内学者，再到1981年苏秉琦先生倡导利用区系类型理论研究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已然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内容。赵宾福先生在《东北新石器》序言中的精辟论述发人深省：“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的研究，主要包括时空框架的构建、谱系格局的探究、生业结构的分析、社会情境的窥视四个方面。其中前两项为基础研究，目标是把考古学文化找出来，把考古学文化串起来，让考古学文化动起来。后两项是专题研究，目标是让考古学文化活起来。基础研究是专题研究的基础，专题研究要以基础研究为前提。”笔者理解，基础研究的三个目标既是新石器考古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程序，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三个重要任务。这也就意味着，明确新石器时代每一类遗存的“姓名”“身份”“年龄”等问题，是新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首要目标（赵宾福，2018），决不能因为“不认识”相关遗存，就刻意回避或有意抹黑“考古学文化”，也不能因为基础研究“费时费力”，就忽略或颠倒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程序。杜社伟完成的《东北新石器》之所以能成为东北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在研究过程中，“理直气壮”地使用了考古学文化，抽丝剥茧地找出了各种考古学文化。赵宾福先生主编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三卷本）之所以能成为 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范本，就是严格遵循了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基础研究在先，专题研究在后。我们相信，随着《东北新石器》在内的《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全三册）的出版，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框架与谱系格局研究》
作者：杜社伟
出版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